

刘次庄《乐府集》、《乐府集序解》探源

喻 意 志

关于刘次庄《乐府集》，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增田清秀在《乐府の历史的研究》中就已进行了讨论，并有该书的辑佚稿。最近《文献》2003年第1期所刊《刘次庄〈乐府集〉考辨》（杨晓霭撰）一文，对该书作了进一步探讨。今笔者从另一角度，对刘次庄《乐府集》、《乐府集序解》的内容概况、编纂思想以及资料来源等方面加以论述，以求有新发见。

一、刘次庄及其《乐府集》、《乐府集序解》的概况

刘次庄，字中叟，长沙人。熙宁七年（1074）赐同进士出身（《宋诗纪事》卷二六作熙宁六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多记其事。《书史会要》卷六言刘次庄“崇宁中为御史”，然宋李埴《十朝纲要》卷十五载徽宗朝御史156人并无刘次庄。^①《金石萃编》卷一四一载刘次庄撰《宋仁寿县君苏氏墓志铭》，无刻石年月。但文中叙苏氏以绍圣四年（1097）十月卒。可知至少在绍圣四年时，刘次庄仍在世。

刘氏正史无传，以书法家闻于世，最妙小楷，能诗文。见载诗作有《王昭君》（《瀛奎律髓》）、《江神祠》（《前贤小集拾遗》）、《日出东南隅行》（《诗话总龟》）、《敷浅原见桃花》（《墨庄漫录》）四首，其中有两首即为乐府体诗作。又作有《戏鱼堂石刻歌》一首。^②此外，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录其乐府《尘土黄》并译、笺,凡三章,前并有序文。

刘氏所编《乐府集》十卷、《乐府集序解》^③一卷最早见录于郑樵《通志·艺文略》乐类“题解”,作刘次庄“《乐府题解》十卷”。盖以二书合而录之。^④之后又见录于《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经部乐类,《直斋书录解题》和《郡斋读书志·附志》集部总集类。从《郡斋·附志》中可见其将乐府诗分为“古乐府所起”、“横吹曲”、“山水”、“音乐”等21类,共收428个乐府诗题(或曰乐府曲调)。然《书录解题》引《中兴馆阁书目》言其“取前代乐府分类为十九门,而各释其命题之意”(亦见《玉海》卷一〇六引《书目》)。从陈振孙所撰解题可知他已亲见《乐府集》及《序解》。然此二书亦赵希弁所藏。赵氏并据之列出分类类目,则其所录当较陈氏所引《中兴目》更为准确。换言之,关于《乐府集》“取前代乐府分类为十九门”云云,应系《中兴目》所误,而陈氏误引之。

据陈氏《书录解题》可知:刘氏《乐府集》所录止于陈、隋诗作,而《序解》则“颇及杜甫、韩愈、元、白诸人”。陈振孙认为《乐府集》是以唐代《乐府歌诗》等书为基础增广而成。此说尚可商榷。按新旧《唐志》所录以《乐府歌诗》为代表的歌辞类典籍确有近10种,然《唐志》的著录仅说明此类书籍在唐时仍传,并不能说明它们在宋代的传存情况。而宋代各目录书所录宋前乐府歌辞类典籍,除吴兢《古乐府》外,余皆不录。这就表明:北宋的宋前乐府歌辞类典籍除吴书外,余皆已散佚。^⑤刘次庄实无法以之为参考。就书目著录来看,他最可能参考吴兢《古乐府》(详后文论述)。

刘次庄《乐府集》最早见引于阮阅《诗话总龟》^⑥。阮书编成于宣和五年(1123),则刘《集》于此即已编成或刊印流传于世。直至明代,梅鼎祚在《古乐苑衍录》中曾引及此书。而孙能传等编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的《内阁藏书目录》卷四云:“《乐府集》四册,全。皆汉魏六朝诗。”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西间朝西,头柜二

层”亦著录“《乐府集》，九本”。^⑦可见此书明代后期依然存世。其盖于明末或清代全部散佚。

今见《乐府集》及其《序解》多赖其它文献征引而得保存。^⑧其中，阮阅《诗话总龟》收录相关资料33条。吴曾《能改斋漫录》1条，何汶《竹庄诗话》5条，《文苑英华》4条，《玉海》4条（12个曲调，中有3条资料10个曲调存疑），蔡正孙《诗林广记》1条，明梅鼎祚《古乐苑衍录》4条。去除重复者7条，存疑者3条，则共得资料42条。然与《郡志》所载21类共428小目相差甚大，约仅存十分之一。

二、刘次庄《乐府集》、《乐府集序解》的内容

增田清秀《乐府の历史的研究》一书中有“刘次庄乐府集·乐府集序解辑佚”稿，实皆《乐府集序解》的内容，而非《乐府集》。据《直斋书录解題》及《内阁藏书目》可知《乐府集》所录皆唐前乐府诗作。而《直斋》云“序文及其中颇及杜甫、韩愈、元、白诸人”，系指《乐府题解》的序文及解题而言。按今辑佚文有九曲^⑨解题提及唐人。其中8次提及李白，有5次系全文引用或节录其作。李贺、杜牧亦各提及一次。至于杜甫、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作品则未见于今辑佚文中。然今存佚文乃较少部分，则可推知《序解》亦曾多次征引杜甫、韩愈、元稹、白居易之作，惟今不存而已。

至于《乐府集》的内容则可由《英华》、《玉海》及《乐府集序解》而得一见。《文苑英华》“乐府”部分曾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与刘次庄《乐府集》参校。可确定其以刘氏《乐府》参校者有五首：刘孝骢《武陵深行》、刘孝威《蜀道难》、费昶《行路难》二首及《木兰诗》古词一首。此五首皆南朝诗作，与《直斋》、《内阁藏书目》所云相合。又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三《乐》“自孝武立乐府”条下注云：“《乐府集》：《汉铙歌十八首》，陆厥拟《李夫人及贵人》、《中山王孺子妾歌》、《临江王节士歌》。庾肩吾拟《未央才人歌》。”又云：“《乐府集》有《黄门倡歌》一首。”^⑩按其中《临江王节士歌》刘次庄解题云：“李白亦有此拟，

而感激奋励有古忠烈之意云。”据“李白亦有此拟”可知除李白外尚有他人拟作，而陆厥无疑是其中之一了。因此，综合观之，《汉艺文志考证》所录《乐府集》之六曲当指此书所录诗作而言，非指《乐府集序解》。此外，《玉海》卷一一〇引《乐府集》云：“《文王操》曰：‘翼翼翱翔，彼凤凰兮。衔书来游，以会昌兮。’”则此《文王操》合前六曲，皆唐前之作，亦与《直斋》、《内阁藏书目》所言吻合。

除上述外，从刘氏《序解》中，亦可窥见《乐府集》的内容。如下：

《木兰》：木兰，孝义女也。勇不足以言之耳。……作是诗者，词意高古，殆与其人相当。（《竹庄诗话》卷二，《〈文苑英华〉辨证》卷五，《诗林广记》卷六）

按：所谓“是诗”，即指《木兰诗》。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五言及《木兰诗》，云：“按刘氏（次庄）、郭氏《乐府》并云：‘古词，无姓名。’”则明证刘氏《乐府集》收录此作。《古乐府》^①收录此曲。又刘次庄《关山月》解题引《木兰诗》云：“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雀乳空城中》，晋傅玄诗曰：“鹊巢立城侧，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龙凤，尝思蛇与虫。”今集所载作“空城中”者，非也。故刘孝威词云：“辘轳丝绠绝，桔槔金薤稠。”（《诗话总龟》卷七）

按：《乐府诗集》卷六八仅录刘孝威词一首，解题则引傅玄之诗，后多“依贤义不恐，近暴自当穷”二句。此曲虽未见录于《古乐府》及《要解》。然郭、刘二《集》的相似暗示二者可能有共同的资料来源。

其他如《怨歌行》（《诗话总龟》卷四四，《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萧注引《总龟》）、《藁砧》（《总龟》卷四四）、《陇头吟》（《总龟》卷七）、《日出东南隅行》（《总龟》卷七，《古乐苑衍录》卷四）、《将进酒》（《总龟》卷七）、《飞来双白鹄》（《竹庄诗话》卷二）、《鸡鸣高树颠》（《总龟》卷三十）解题中所引诗作，皆见于吴兢《古乐府》、《要解》中。《渡易水曲》（《总龟》卷七）、《豫章行》（《总龟》卷七，《古乐苑衍录》卷四）、《走

马引》(《总龟》卷七,《古乐苑衍录》卷四)中所引诗作,《要解》中收录。《桃叶歌》(《总龟》卷七)所引古词,《古乐府》中收录。

从以上分析来看,刘氏在上述13曲解题中提到的古辞或作家诗作,应以《乐府集》为据,亦即《乐府集》已收录上述作品。而其中除《雀乳空城中》外,余又皆见于《古乐府》^⑨。按《古乐府》一书在宋代流传很广,不仅宋人笔记、诗话中多见征引,且多作为宋人乐府诗集编纂之重要来源,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周紫芝《古今诸家乐府》等。刘次庄定亦见之,其解题参考《要解》可为旁证。从上分析可见,《乐府集》所录诗题(存疑者除外)在《古乐府》(就目前已辑佚者而言)中未录者仅12曲。此亦说明《乐府集》所录歌辞多以《古乐府》为据。

从《书录解题》及《内阁藏书目》可知刘次庄在《乐府集》中皆录唐前乐府诗作是因循了吴兢的观点。但他在《序解》中则突破了此一制约——多征引唐人作品释解乐府诗题。其原因有二:(一)吴兢所处为初盛唐之时,其编纂《古乐府》及《要解》的目的是释解乐府古题,以正文人拟作乐府诗时“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之不良风气。故唐前乐府便属“古乐府”的范畴。而刘次庄所处为北宋后期,正是宋人全面总结唐诗的时代,其所见唐人乐府诗作远多于吴兢所见。因此,他一方面因循吴兢对乐府诗所作的时代断限,而另一方面他在解题中又加以创新和发展,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资料特色及当时人的乐府观。(二)相对于收录诗作的《乐府集》而言,《序解》不仅使作者能充分发表己见,同时亦给予补充阐释的机会。也就是说,《乐府集》未收唐人乐府的缺憾在《序解》中得到弥补。由此可见:刘次庄《乐府集》所录皆唐前乐府诗作,多以《古乐府》为据,然今存较少。《乐府集序解》则对《乐府集》所收乐府诗题加以阐释,其解题多引唐人诗作,与《乐府集》形成鲜明对比,又相互补充。

三、刘次庄《乐府集》及其《序解》的创新

刘次庄《乐府集》、《序解》仿吴兢《古乐府》、《要解》的体例编

成,如采用诗作与解题分录的方式,所收乐府诗断限于唐前等。但刘次庄亦有所创新,并体现了独特的风格。具体表现如下:

一、刘氏全未参考吴兢关于乐府的分类。吴兢从音乐的角度将乐府诗分为相和歌、鞞舞歌、横吹曲等10类。而刘次庄则从内容的角度采用类书编纂的分类方式将之分为21类。正因刘氏编纂《乐府集》时多据以《古乐府》,故采用新的分类是其摆脱前人编纂乐府诗的范式并体现自身特色的有效措施。当然,现在看来,吴兢的分类更为科学,而刘次庄的分类则流于繁琐。

二、刘氏亦未采用吴兢解题的叙述方式,而是采取评价诗作内容的方式释解乐府诗题。本文以《竹庄诗话》所引归属于刘氏《序解》,其原因即在此。《竹庄诗话》所引五条资料,有二条(《木兰》、《飞来双白鹄》)引作“《乐府解题》”,三条(《君马黄》、《昭君词》、《临江王节士歌》)引作“《乐府题解》”。笔者判断其皆非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中引文,原因有三:(一)《四库提要》言此书以“刘次庄《乐府集》”等书引证。(二)《乐府集序解》有多种称呼,如《中兴馆阁书目》作《乐府解题》,《直斋书录解題》、《通志·艺文略》作《乐府题解》等,皆与《竹庄诗话》所引相合。(三)最重要的原因是:此五条资料的解题风格与吴兢《要解》格格不入,而与刘次庄《序解》的风格相统一。吴兢《要解》不及唐人诗作^⑨,所言皆唐前作品;而刘次庄则每每言及李白、李贺、杜牧等唐人诗作。吴兢解题多以《古乐府》所录诗作为据,多提及乐府作品,并叙命题之意;刘次庄则较少提到《乐府集》中作品,而多引唐人诗作,并作较为主观的论述。以下举例加以说明。如《飞来双白鹄》,刘次庄所述如下:

刺世俗薄伪,失夫妇之道也。流离困苦,要与之终始。中道弃去,从新知之乐。岂义也哉。然而作是诗者,怨思虽深,而词不迫切,盖尽所以为妇之理云。

吴兢则云:

右古词:“飞来双白鹤,乃从西北来。”言雌病,雄不能负之

而去,“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虽遇新相知,终伤生别离也。又云“何尝快,独无忧”,不复为后人所拟也。

又如《日出东南隅行》,刘氏认为此题当歌罗敷为贞节烈妇,批判卢思道、张正见、王筠等作皆有失雅正,最后并自拟作辞一首(五言十二句),言其“直欲规诸子以就雅正”云云。这些都体现了刘氏主观性较强的一面,^⑨但也体现了他释解乐府诗题的独特风格。此风格盖与其作为书法家有关,所采取的是“率性而为”方式。而吴兢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其解题亦采取客观的、尊重历史事实的叙述方式。吴氏的解题方式更多为后人所继承,如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即受其影响较大。

四、刘次庄《乐府集》、《乐府集序解》的资料来源

前文已论吴兢《古乐府》是刘次庄《乐府集》的主要资料来源。而其《序解》的部分资料来源则是《乐府集》所收诗作及收录唐人乐府诗的别集或总集。以下主要就《序解》的资料来源作进一步探讨。通过比勘可见,刘氏撰写《序解》时曾参考《文选》、《乐府古题要解》、《古今注》、《通典》或《旧唐书·音乐志》等文献。以下分析之:

1. 参考五臣注《文选》

《序解》中明确征引其他文献的题解共10条,所引书籍11种:《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孔演图》、《尔雅》、《水经注》、《山海经》、《风土记》、《物理论》、《汉武内传》、《楚辞》。征引诗文4篇:左思《三都赋》、梁简文帝《行幸甘泉宫歌》、潘岳《笙赋》、《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除《行幸甘泉宫歌》外,余皆见于《文选》。其中,《枣下何纂纂》题解所引潘岳《笙赋》乃参考五臣注《文选》。其云:

潘安仁《笙赋》云:“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清散。咏桃园之夭夭,歌枣下之纂纂。歌曰:枣下纂纂,朱实累累,宛其落矣,化为枯枝。”释者谓之“纂纂,枣花也”。(《诗话总龟》卷三十)

按:据六臣注《文选》卷十八潘岳《笙赋》可知,刘氏所谓“释者”即指张铄。张铄注云:“《张女弹》,曲名也。其声哀,言且辍之。《广陵散》,曲名,将流行其音。《园桃》、《枣下》,古曲名。夭夭,桃色。纂纂,枣花也。”刘氏即本于此。

刘次庄《昭君词》解题既参考了《乐府古题要解》,又参考了五臣注《文选》中石崇《王昭君》诗序。其解题云:

石崇奴绿珠自制《王昭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汉家子”是也。王明君者,本为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官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竹庄诗话》卷三)

按:“石崇奴绿珠自制《王昭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汉家子’是也”句,本自《乐府古题要解》:

……始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昆莫,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然。晋文王讳“昭”,故晋人改为“明君”。石崇有妓曰绿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汉家子”是也。……而后“王明君”云云,乃石崇《王昭君》序。石崇此诗既见于《文选》(卷二七),亦见于《玉台新咏》(卷二)。比较刘氏所录与五臣注、李善注《文选》及《玉台新咏》之异同,可见刘氏所本。如下表:(表中仅录四者中有异文之句)

刘次庄解题	五臣注	李善注	玉台新咏
王明君者,本为王昭君,	本为	本是	本为
以触文帝讳改之。	改之	改焉	故改
元帝以后官良家子明君配焉。	明君	昭君	明君
其送明君,亦必尔也。	尔	必尔	必尔
其造新之曲,	造新之曲	造新曲	新造之曲
多哀怨之声。	哀怨之声	哀怨之声	哀声
与刘氏解题相异处	1处	4处	3处

由上可见，刘氏解题所引与五臣注《文选》仅一处异文。而与李善注及《玉台新咏》分别有四、三条异文。加之前文已证刘氏参考五臣注。故可判断刘氏《王明君》解题亦以五臣注《文选》为据。^⑤其编纂《乐府集》盖亦参考之。刘氏是否参考李善注《文选》，尚无明证。

2. 参考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刘氏《序解》的叙述风格虽迥异于吴氏《要解》，且其解题亦与之颇异，然其亦曾参考《要解》。如《董逃行》，刘氏解题几与《要解》全异，但“傅休奕《九秋篇》十二章，乃叙夫妇别离之思”句，却本自《要解》：“……晋傅休奕著《历九秋篇》十二章，具叙夫妇别离之思，亦题云《拟董桃行》，未详也。”又如《日出东南隅行》解题：

古词曰：“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旧说邯郸女子姓秦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陌上，赵王登楼见而悦之，置酒，欲夺焉。罗敷弹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从。今其词乃罗敷采桑陌上，为使君所邀，罗敷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论者病其不同。大抵诗人感咏，随所命意，不必尽当其事，所谓不以辞害意也。……（《诗话总龟》卷七，《古乐苑衍录》卷四）

按：其所谓“论者”即指吴兢。《要解》曰：

右古词：“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旧说邯郸女子秦姓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置酒欲夺焉。罗敷善弹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从。案其歌词称罗敷采桑陌上，为使君所邀，罗敷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与旧说不同。若晋陆士衡“扶桑升朝晖”等，但歌佳人好会，与古调始同而未异。

可见刘次庄此曲解题的前一部分即本自《要解》。

此外，《藁砧》全文、《君马黄》解题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录李白诗作并加评论），亦几全同《要解》。而石崇《王昭君》的部分解题亦参考了《要解》。刘氏《白头吟》解题云：“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妻，文

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后录李白拟作，略）”或本《要解》，或本《西京杂记》卷三。

3. 参考《古今注》

刘次庄《走马引》及《别鹤操》的解题参考了《古今注》。以下分述之。

《走马引》解题云：

樗里牧恭所作也。为父报怨杀人，亡匿山下。有天马夜降，围其室而鸣。觉，闻其声以为吏追，乃奔去。旦观乃天马迹。因惕然大悟曰：“吾之所处将危乎！”遂荷杖去，入沂泽中，援琴而鼓之，为天马声，曰《走马引》。而张敞为京兆尹，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风俗曰：“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驱驰不止，至于死。故张率作此引曰：“剑戟且归去，吾畏路旁儿。”（《诗话总龟》卷七，《古乐苑衍录》卷四）

按《要解》及《古今注》皆有此曲解题。如下：

乐府古题要解	古今注
右樗里牧恭所造也。为父报讎，杀人而藏匿山谷之中。有天马夜降，鸣于其室。奔逃入沂泽中，援琴而弹之，为天马之声，因以为引焉。	《走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为父报怨杀人，而亡匿于山之下。有天马夜降，围其室而鸣，觉，闻其声以为吏追，奔而亡去。明旦视之，乃天马迹也。因惕然而悟曰：“吾所处之地将危乎？”遂荷粮而去，入于沂泽中，援琴而鼓之，而为天马之声，曰《走马引》也。

通过校勘可见，刘氏解题之前半部分颇同《古今注》。

又《别鹤操》解题云：

高陵牧子作也。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不餐。”后人因为乐章焉。（《诗话总龟》卷四四）

乐府古题要解	古今注
右旧说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无子,父兄将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悲,乃援琴而歌曰:‘将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揽衣不寐兮食忘餐。’后人因传以为曲焉。	《别鹤操》,高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悲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衾不寐食忘餐。”后人因以为乐章焉。

由上可见,刘氏解题更同《古今注》,如二者皆作“高陵牧子”,《要解》则作“商陵牧子”;二者歌辞皆为七言句式,《要解》则为中有“兮”字的骚体句式等。

4.参考《通典·乐典》或《旧唐书·音乐志》

刘次庄《团扇歌》解题云:

晋中书令王珉好持白团扇,其侍人婢谢芳歌之,因以为名。一说珉与婢有情好甚笃。婢捶挞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团扇,其婢故制《白团扇歌》以赠珉,云:“团扇复团扇,许持自遮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诗话总龟》卷七)

按:《乐府诗集》卷四五此曲解题引《古今乐录》,然与刘氏解题出入颇多。据比勘,刘氏所谓“一说”系参考《通典·乐典》或《旧唐书·音乐志》。《通典》卷一四五云:

《团扇歌》者,晋中书令王珉与婢有情,爱好甚笃。婢鞭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团扇,故云:“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遮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

《旧唐书·音乐志》所录“《团扇歌》者”作“《团扇》”;“鞭挞”作“捶挞”,余悉同《通典》。可见刘氏当参考《通典》或《旧唐志》。刘氏《乌夜啼》解题亦如此。其云:

宋临川王义庆所造。时为江州刺史,闻命而哭,文帝怪之,召还家,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及改为南州,因作此歌,词云:“笼窗窗不开,夜夜忆郎来。”今所传非

义庆本旨。词曰：“歌舞诸少年，娉婷无种则。菖蒲花可怜，闻名不相识。”（《诗话总龟》卷七）

按：《要解》有此解题，然刘氏参考了《通典》或《旧唐志》。如下：

乐府古题要解	通典
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笼窗窗不开，夜夜望郎来。”亦有《乌栖曲》，不知与此同否。	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章郡，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文帝所怪，征还。义庆大惧，伎妾闻乌夜啼声，叩斋合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兖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忆郎来。”今所传歌似非义庆本旨，辞曰：“歌舞诸年少，娉婷无种则。昌蒲花可怜，闻名不相识。”按：《旧唐志》与之微异。

比较可见，刘氏解题更接近《通典》或《旧唐志》。

综上所述，可将本文总结如下：刘次庄《乐府集》及《序解》系仿吴兢《古乐府》及《乐府古题要解》之例编成。《乐府集》所录皆唐前乐府诗作，《古乐府》系主要参考文献。《乐府集序解》与《要解》颇异，体现了其独特风格；其资料来源除所引文献及《乐府集》外，尚有《文选》、《乐府古题要解》、《古今注》、《通典》或《旧唐书·音乐志》等典籍。

注：

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九“法帖释文”条。其已辨《四库全书总目》系沿《书史会要》之误。

② 参增田清秀：《乐府の历史的研究》第五章“刘次庄の《乐府集·乐府集序解》批判”，东京创文社1975年版。又《四库提要辨证》卷九、《宋诗纪事》卷二六。

③ 《乐府集序解》，《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经部乐类作《古乐府序解》。《郡斋读书志·附志》作《乐府序解》。《中兴馆阁书目》作《解题》。《直斋书录解題》作《题解》。又，除《秘书目》未著录《乐府集》以外，其余四种书目皆同

时著录《乐府集》及其《序解》。

④ 郑樵所据为馆阁目录或私家目录。由此可见刘氏《乐府》在绍兴三十二年(1062)前已有书目著录。郑樵很可能亦见此书。

⑤ 《太平御览》引及“乐府歌诗”5次,“乐府歌”4次,或即指《乐府歌诗》。然《崇文总目》已未著录,则当于北宋前期全佚。

⑥ 阮书引作“《乐府集》”,然其实为《序解》之内容。详后文辨析。

⑦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二著录刘次庄《乐府题解》十卷。然此目所录除本朝书籍外,亦通收前代已佚之书,并杂抄前朝书目。其所录刘次庄《乐府题解》系抄自《通志·艺文略》,不足为凭。

⑧ 按:除《竹庄诗话》引作“《乐府解題》”或“《乐府题解》”外,余多引作“《乐府集》”,然实本自《乐府集序解》,而非《乐府集》。可肯定为引自《乐府集》的是《文苑英华》中的五首诗作。《玉海》所引几条盖同《英华》。

⑨ 即《临江王节士歌》、《白头吟》、《胡姬年十五》、《将进酒》、《玉阶怨》、《怨歌行》、《独不见》、《豫章行》、《君马黄》九曲。

⑩ 见《玉海》第七册。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

⑪ 按吴兢《古乐府》一书已佚,今据笔者《古乐府》辑佚稿。《乐府古题要解》皆据四库存目丛书影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

⑫ 吴兢《要解》据《古乐府》编成,则凡有解題者亦皆有辞见录于《古乐府》(其皆以“右”云云为解題之始,可知);然《古乐府》所录则未必皆见于《要解》。故《乐府集》所录曲调若未见于《古乐府》而仅见于《要解》者,亦判为《古乐府》收录。

⑬ 其惟一例外是在《白头吟》解題中引“唐虞世南”云云,然虞世南系由隋入唐之诗人。

⑭ 正因如此,增田清秀批判刘氏太主观,认为其拘泥于乐府原作之内容,并以其为标准评价同题作品之优劣,无视乐府解題之传统与乐府诗创作之客观事实。他认为,刘氏不能算是合格的乐府解題作者,但称得上是一个有见识的“乐府评论家”。详见“刘次庄の《乐府集·乐府集序解》批判”。

⑮ 增田清秀认为“故叙之于纸云尔”,乃刘次庄语,“纸”乃“词”之误,即其后录刘氏所作《王昭君》诗,只是《竹庄诗话》略去未引而已。实误。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艺术研究所